

SINO US TRADE WAR

国运之战

决策层贸易战内参（上）

马弘 陈沁 ——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国运之战：决策层贸易战内参 (上)

马弘、陈沁 著

浙版数媒

版权信息

国运之战：决策层贸易战内参（上）

马弘、陈沁 著

出品人：范少卿

策划编辑：刘强 易家成

联系我们：snailreader@126.com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8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13860-20180705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2018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片刻系列电子书出版总序

感谢你阅读网易蜗牛读书出品的片刻系列电子书。

片刻是什么？

这是主打短时深度阅读的系列作品。我们邀请了社会各行业领域的朋友在书中分享他们有趣的见闻，以高效表达方式缩减阅读时间，以深度行业积累提升阅读体验。

这里既有最真实的个人经历，也有最好玩的内幕趣闻。我们聚焦各个角落的精彩，让外行也能享受看懂门道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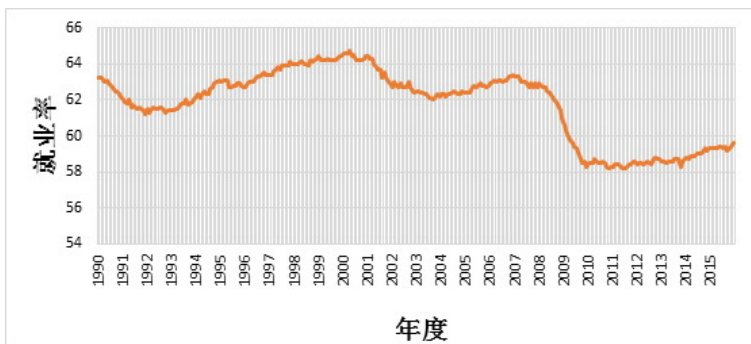
世间凡尘，片刻之间。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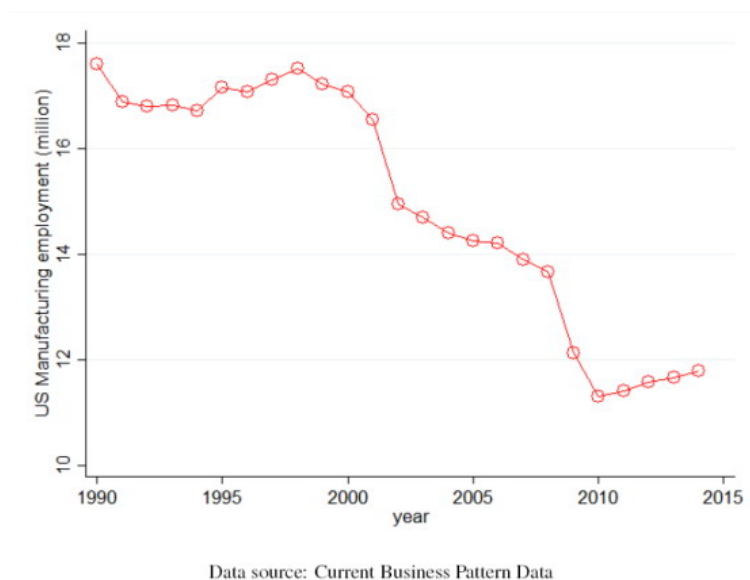
2016年，注定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种种记录。在这一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欧洲一体化的大厦开始崩塌。11月，唐纳德·特朗普，著名的地产商、电视节目制作人，从未担任州长或者议员之类公职的政治素人，战胜了经营政治40年的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现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的第45任总统。从这一年起，“黑天鹅”事件，一个以前欧洲人代指不可预测之重大事件的习语⁽¹⁾，成为中国媒体坊间甚至专业人士嘴边最常使用的词汇。

特朗普的当选，跌破了热衷政治的评论家们的眼镜，但却绝不是偶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尽管产出特别是制造业产出不断增加，就业率，特别是制造业的就业比率却不断下降。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没有就业的增长”（Jobless Growth）。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全社会16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从1990年的63%，逐步下滑到2011年的58%。制造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90年美国制造业大概吸纳了近1800万的劳动力，到2014年，超过600万制造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占1990年全部制造业工人人数的三分之一。

【图1：美国就业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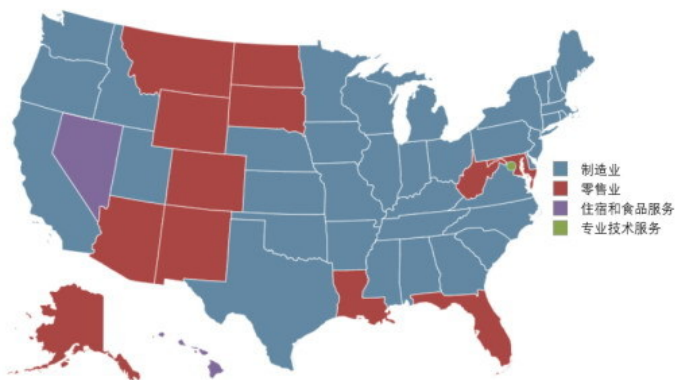
【图2：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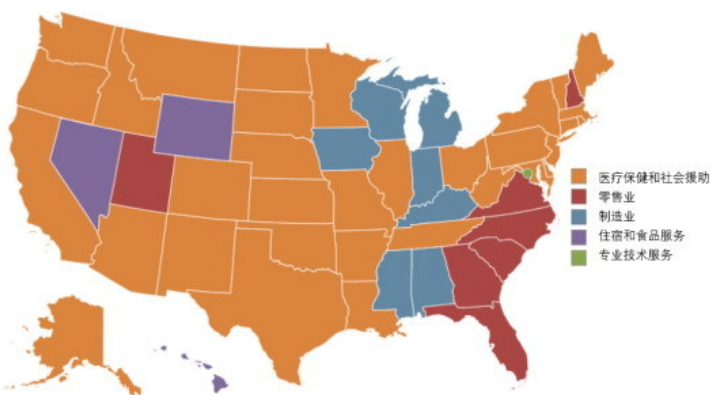
因此，2016年大选前夕的美国，处于严重的就业增长停滞、传统制造业衰败，经济复苏乏力的状态。回到90年代，除了东南南部的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中部的怀俄明、犹他、南达科他、北达科他、科罗拉多，南部的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东部的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等州，以及遥远的阿拉斯加之外，美国其他的38个州均以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提供最大的就业岗位。而到了2015年，以制造业为主要雇主的州已经只剩下8个。产业工人——传统上美国中产阶级群体——正在被技术进步、产业南移，和全球化向前疾驰的列车所抛弃。

【图3：美国各州就业人数最多的主要行业】

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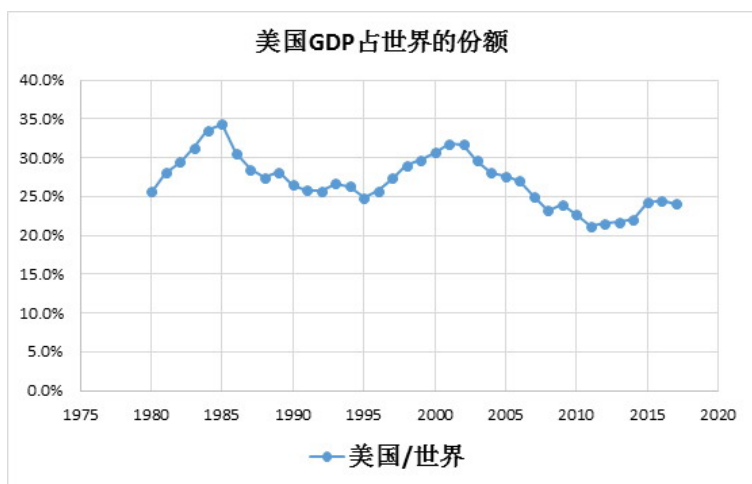
2015年



J.D.万斯 (J.D.Vance) 在他2016年影响巨大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里，将生活在俄亥俄州铁锈地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描绘为一个没有希望的群体，他们面临着不断恶化的生活前景：工作岗位在减少、生活水平在下降，离婚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在下降。由于缺乏技能和主观动力，他们很难离开家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向上流动的阶梯被封闭，对未来失去希望，而酗酒、滥用药物、甚至吸毒而直至死亡。这批低教育水平的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在21世纪的头15年中出现上升。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将之称为：“死于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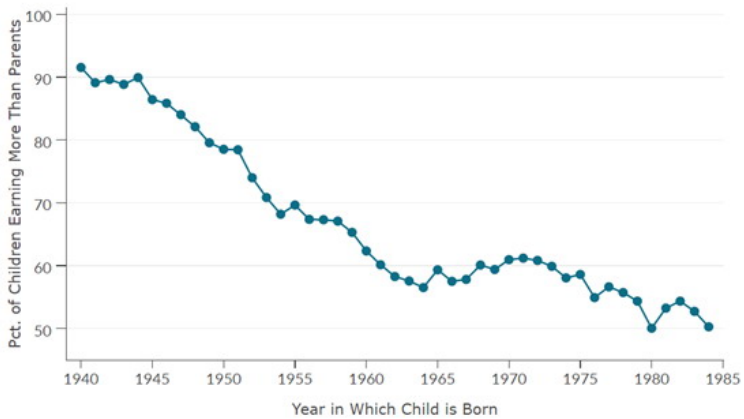
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总是相伴而生，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美国GDP占到全世界GDP的近35%，社会底层90%的人群也掌握了全部财富的35%，达到顶峰。30年之后，这两个比例都下降到22%左右。很明显，财富在增长，但分配越加不公。愤怒如岩浆在海面下沸腾，侵蚀着冰山的根基。

【图4：美国GDP占世界的份额】



民众需要一个答案，为他们的境遇负责。在2008-2009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答案是那些前1%的华尔街精英，于是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2016年，情况并没有好转，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一项研究发现，自1979年以来，中位数的美国家庭收入在扣除通胀的影响后就几乎没有变化。201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经济院士的公共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领衔的一项研究得到令人沮丧的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孩子在成年以后比父母收入更高的概率从90%下降到了50%。也就是说，从统计意义上讲，这一代美国人平均而言在生活水平上不如上一代。

【图5：美国的代际流动】



图片来源：Raj Chetty等人的研究，<http://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

-
- (1) 欧洲人一度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因此黑天鹅即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这一信念在人们发现澳大利亚确实存在黑天鹅后崩溃。

目 录

序

第一部分：贸易战的起源

- 1．总统的承诺
- 2．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 3．大国竞争的悲剧
- 4．特朗普的武器

第一部分：贸易战的起源

1 . 总统的承诺

对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等方面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基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我们必须防止其他国家生产我们的产品，偷窃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工作岗位。保护行动会带来繁荣和强大。……我们会把工作、边境、财富、还有我们的美国梦统统带回美国。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就职演说（2017.01.20）⁽¹⁾

2009-2016年在位的奥巴马总统没有能够扭转局面，民众开始失去耐心。很快，商业精英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参加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尽管不被看好，特朗普显然比政坛老人希拉里·克林顿更接地气，他敏锐地抓住了选民的焦虑情绪，旗帜鲜明地在自己的竞选网站上列出了“唐纳德·特朗普为自由贸易而战，重塑美国经济的七条计划”⁽²⁾：

1 . 退出还没有被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 . 任命强硬且明智的贸易谈判代表来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3 . 指示商务部长查明外国每一项违反贸易协定而有损我国工人利益的行为，并指示有关单位运用美国和国际法规定的一切措施来制止这些行为。

4 . 通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缔约伙伴国（注：这里指加拿大和墨西哥），要求立即重新谈判，为我国工人争取更大的利益。如果加、墨两国不同意重新谈判，我们就通知他们美国打算退出该协定。美国要求墨西哥取消（对美国出口）征收的增值税，并关闭血汗工厂。

5 . 指示财政部长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6 . 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上针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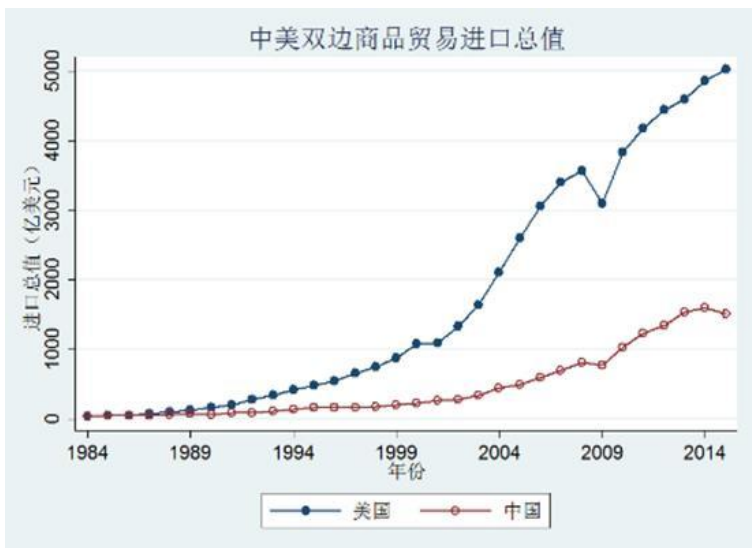
国提出贸易制裁。中国（对出口的）不公平补贴行为违背其加入世贸组织所签署的条约。

7. 如果中国不停止其包括盗窃美国贸易秘密在内的非法行为，（我）将利用总统的一切合法权力采取措施来应对贸易争端——包括采用1974年《贸易法》第201节、301节以及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第232节所规定的关税惩罚措施。

显然，除了指责竞选对手执政无能之外（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同为民主党人，后者还是前者第一任总统期间的国务卿），特朗普将美国工薪阶层的困境归罪于贸易和全球化。如果贸易和全球化要为“美国梦碎”负责的话，那么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显然是那个最大最容易击中的目标。事实上，过去的每一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布什，再到奥巴马），在竞选活动中都将中国作为目标批判，指责中国应该为（至少部分的）美国失业负责，并承诺对日益增强的来自中国的竞争采取行动。而特朗普的“炮火”尤其猛烈：在他就贸易而列出的7点计划中，5-7点直接点名中国，而1-3点也与中国密切相关。

这样的批评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中美双边贸易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增长迅猛，但又极不平衡。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统计，从1984年到2015年，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值从39亿美元增加到150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3.2%；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从33亿美元增加到502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高达18.7%。从重要性上看，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呈明显上升趋势，2015年达到近22%，而美国占中国进口份额则从早期的15%逐步降低至8%左右。显然，如果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的话，那么仅就商品贸易而言，压舱石的位置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图6：中美双边商品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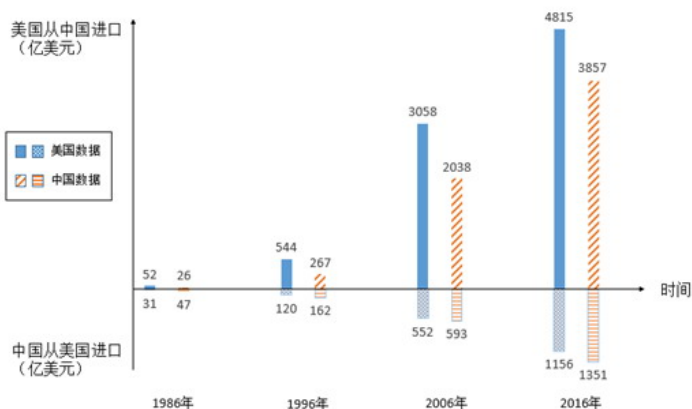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使用进口国统计贸易。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数据使用的是进口国汇报进口数值，而美国汇报的从中国进口金额，显著地高于中国汇报的对美国出口金额。同样，美方统计的对中国出口货值，与中国海关统计的从美国进口货值存在一定的差异。两项加起来，就造成了美方统计的美中贸易逆差，比中方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要超过1000亿美元之多。除去出

口和进口报关不同的统计口径（出口通常用FOB价,而进口则通常在FOB基础上加运费、保费即CIF价），转口贸易（包括东向的直接贸易加价）是最主要的原因。举个例子，中国出口到香港的货物，经过在港商人加价转运至美国，在中国海关统计里是对香港出口，在美国海关统计按照货物来源地统计，是从中国大陆进口。还有一种情况下，大陆直接出口美国，但香港地区、新加坡、或者台湾地区的中间商以离岸转手买卖的方式赚取中间价差（即东向的直接贸易加价）。因此中方可能低估了中美顺差，而美方则高估了美中逆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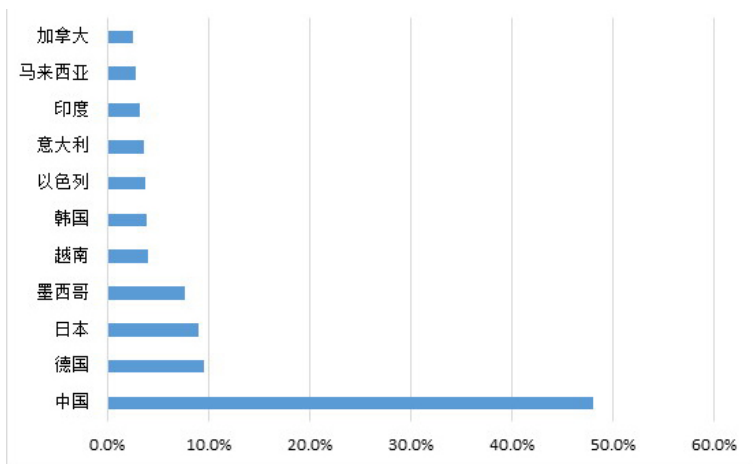
无论用哪一种统计口径，有一点毋庸置疑：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数值逐年扩大。图7展示了这一逆差迅速增大的规模。图8则展示了中国在美国总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在2015年，按照美国统计局的统计，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48%，远远超过美国的其他主要逆差伙伴：德国（9.5%），日本（9.0%），墨西哥（7.7%）。

【图7：中美货物贸易失衡】



数据来源：根据中美统计数据整理。

【图8：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伙伴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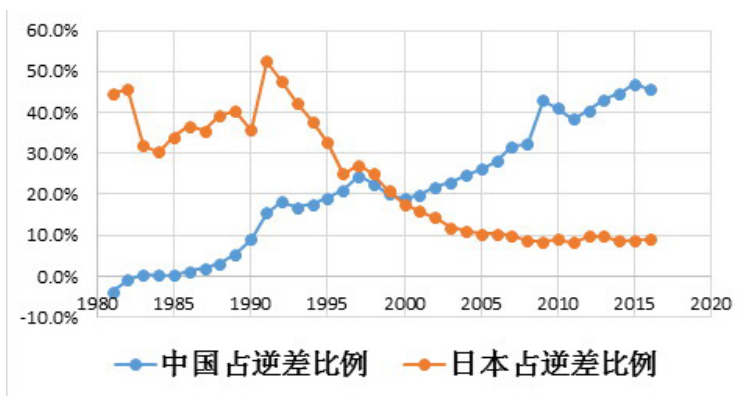
数据：UN-Comtrade，2015

把视角放到一个更长时间跨度里看，在1981年，美国对中国还是贸易顺差，到1991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了15%，到2001年，中国入世之年，这个比例是20%，在之后的15年里，中国占美国逆差的份额翻了一倍以上，上升到了46%。问题早已大到无法忽视：早在2003年，中国入世的第二年，西方媒体已经在抱怨中国出口造成的压力，那时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不过1300亿美元。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近3000亿美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更是在他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中建议立刻对中国“采取措施”（taking on China）。

在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眼中，贸易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支大于收显然不是一个好生意。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另一个国家占据美国贸易政策的头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占美国对外商品贸易逆差的比重维持在40%上下，在最高峰的时刻（1991），甚至占到了52.6%。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有趣的是，在1988年，日美贸易纠纷正值白热化状态的时候，作为知名地产商的特朗普，接受了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奥普拉的采访。在采访中，特朗普对日美贸易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彼时，物美价廉的日本汽车、彩电、录像机占领了美国市场，日本商人相继买下洛克菲勒大厦、帝国大厦等纽约地标性的建筑。著名作家傅高义甚至写下“日本第一”这本书来夸赞日本经济已经赶超美

国。

【图9：中国、日本占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比重】



数据：UN-Comtrade，1981-2016

1980年代的美国，反日情绪也空前高涨。特朗普给出的药方与他今天所做的如出一辙：对日本商品征税，20%。在特朗普看来，如果一个国家卖给另一个国家的商品多过它从对方那里买的，那这个国家就赚了。反过来，买多于卖的国家在贸易战中更容易赢，因为对手原本赚的多，现在就会输的更多。这种重商主义的看法即使在今天也非常具有迷惑性。简单的讲，它的逻辑如下：一个国家的GDP可以表达成以下几项之和：

$$GDP = C + I + G + X - M$$

其中，GDP代表了一国的产出，也代表总支出。C是消费，I是投资，G是政府净支出，而X是出口，M代表进口。因此，为了增加GDP，似乎只需要尽可能地增加X（出口）而减少M（进口）。依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你会发现：是的，既然对进口征收关税能够减少进口，那么，这么做就能够增加GDP和需求，进而创造就业！

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注意：这个公式是一个会计等式，并不适合用来做因果推断。比如生产效率提高能够促进出口，替代进口，从而提高GDP（通过提高X-M），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提高生产率，而

不是直接减少进口。更糟糕的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的方式减少进口（同时提高进口价格），会降低国内厂商面临的竞争压力，结果是降低了他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著名国际贸易学家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对上个世纪80年的美国对日本汽车进口限制的实证研究就发现，在进口关税和配额的保护下，美国本土汽车公司的生产率并没有提升，而销售价格却大幅提高。最糟糕的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采取这种重商主义的思路，那么每个国家都尽可能地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但是这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重商主义的另一种思考方式据说来自于林肯。在美国工业化的早期，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利益的林肯曾经说“我对关税了解得不多，但是我知道当我们从外国购买工业品，我们得了他们得商品，外国人得了我们得钱；当我们从本国购买工业品，商品和钱都到了我们手里。”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每个个人都只和自己交易才是最佳策略。事实上，一件商品的真正成本是制造它所消耗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而不是交易发生时支付的价格。如果生产1000件衬衫所需要消耗的劳动力可以生产1辆汽车，而这辆汽车能够在隔壁国家换回来1200件衬衫，那么聪明的做法当然把全部劳动力资源投入生产汽车，到隔壁换回衬衫。这就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Ricardo）所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的简化版本。^③ 李嘉图模型的思想简洁有力：各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以换回其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能够给交换双方都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里，为了简化起见，劳动生产率被设定为固定不变。而贸易所带来的另一大好处是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在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有着精彩的描述。在这本书里，斯密记录了他在英国的一家图钉工厂里所观察到的景象。那家工厂只有10个人，却每天能够生产48,000颗图钉，这完全是由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如果每个工人独立完成制造图钉的所有工序，那他每天只能造20颗图钉，整个工厂一天的总产量也不过200颗而已。因此，分工带来了生产率的极大提高。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市

场，分工带来的就只会是产能过剩，分工也就不会发生。因此，国际贸易（或者说更大的国际市场）不仅仅带来各国依据比较优势的分工和交换，还通过创造需求促进了新的分工和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大幅逆差的国家（消费国）和一个大幅顺差的国家（生产国）之间爆发贸易冲突、互筑贸易壁垒的情况下，逆差国拥有市场因而拥有更大的缓冲余地。⁽⁴⁾对于顺差国来说，则需要在短期内为产能和存货寻找新的市场需求，在中长期，则需要通过降低国内交易费用和推进城市化来实现。

- (1) 原文是：“Every decision on trade, on taxes, on immigr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will be made to benefit Amer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families. We must protect our borders from the ravages of other countries making our products, stealing our companies, and destroying our jobs. Protection will lead to great prosperity and strength...We will bring back our jobs. We will bring back our borders. We will bring back our wealth. And we will bring back our dreams.”
- (2) **Donald J. Trump's 7 Point Plan To Rebuild the American Economy by Fighting for Free Trade**. 原文来自 <https://www.donaldjtrump.com/policies/trade/>。最后登录日期：2016年11月10日。目前这个竞选宣言已经被撤下。
- (3)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上都会教授的“比较优势”的例子在论述上更为严谨。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两种商品：衬衫和汽车。假设生产两种商品都只需要用到劳动力。A国生产1件衬衫需要1个工人，生产1辆车需要1000个工人。B国生产1件衬衫需要2个工人，生产1辆车需要2400个工人。尽管A国在生产两种产品上都更有效率，在开放贸易的情况下，A国应该专业化生产汽车，而B国应该专业化生产衬衫，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换。
- (4)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华民教授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

2. 全球化的赢家与输家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拥抱爱国主义的教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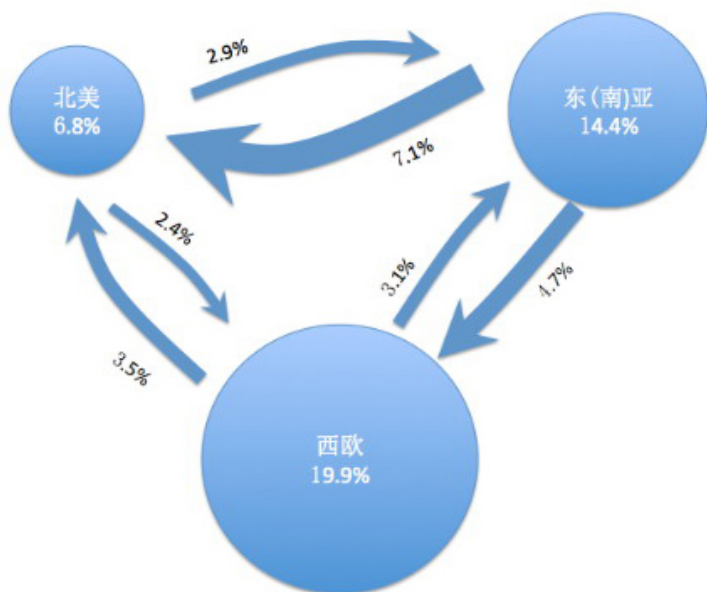
——唐纳德·特朗普 在2018年9月25日联合国会议上的演讲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同在绝大多数时候，贸易能够给参与贸易的各国带来福利改进。二战以来世界各国生活水准的显著提高和全球贸易的扩张相伴而生。集装箱货船的发明使得海运成本大幅降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在1995年替代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各国在一个日益统一的全球大市场下进行贸易往来确立了“游戏规则”^①，旅行越加快捷，信息技术更使得技术、知识的传播只需要在电脑前动动鼠标。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惊呼：距离消失了！世界变平了！

但是世界并没有变平。它甚至变得更加起伏不平。在没有摩擦的地面，水只会加速流向最低处。在物理距离不再构成显著障碍和成本的贸易世界，生产和消费将会进一步分离。厂商会在全球寻找性价比最高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中可以拆分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份部件都将会聚集到禀赋最适合生产他们的地方去。世界并没有变平。从经济总量上看，40年前，按照GDP排名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占全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二，2017年前十选手们仍然贡献了这么多。区别是：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加拿大）作为一个整体在GDP，制造业产值和出口等经济指标上均有所下滑。西班牙、墨西哥失去了前十的交椅，而龙和象（中国和印度）站到了舞台中央。

集聚效应使得经济活动在一国内部向一些城市集中，集聚也使得经济和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向若干地区集中，最终形成全球贸易的三个集团。

【图10：全球贸易的三极】



数据来源：全球货物贸易占比，根据2015年UN-Comtrade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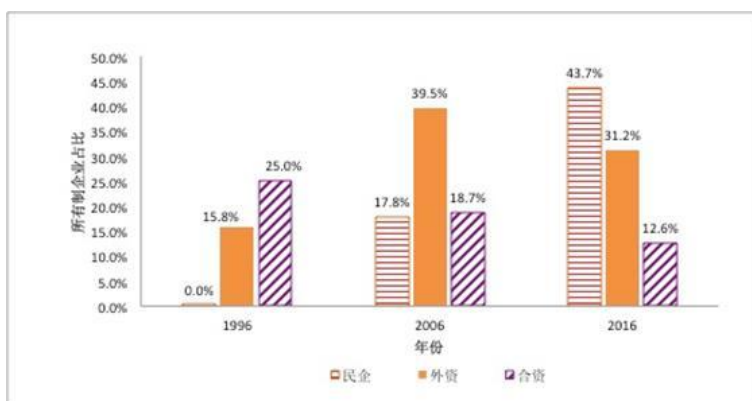
在这幅图上，圆圈的大小代表了三个集团内部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体量，箭头的粗细则代表三个集团之间的贸易体量，我们用百分比来记录其分别占全球总贸易额的比例（注：2015年全球总出口额16.5万亿）。能够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这个全球交易网络的国家，资本流入，经济活动增加，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竞争力不够而被全球价值链抛弃在外的国家，则成为输家。

从图上还可以看到：东（南）亚内部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总贸易额的近15%。原因正是全球价值链，使得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围绕价值链的零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段紧密配合、分工合作。“亚洲工厂”，由此得名。而这个名字也说明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以生产为核心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将成品运送到北美和欧洲。亚洲的禀赋（劳动充裕）、收入（均值较低）、和文化特征（崇尚节俭，导致生产大于消费，储蓄多于投资），与大洋彼岸“借钱也要消费”的国度一拍即合，由此也形成了图上东亚东南亚对北美出口全球贸易额的7.1%,进口仅仅占2.9%的巨额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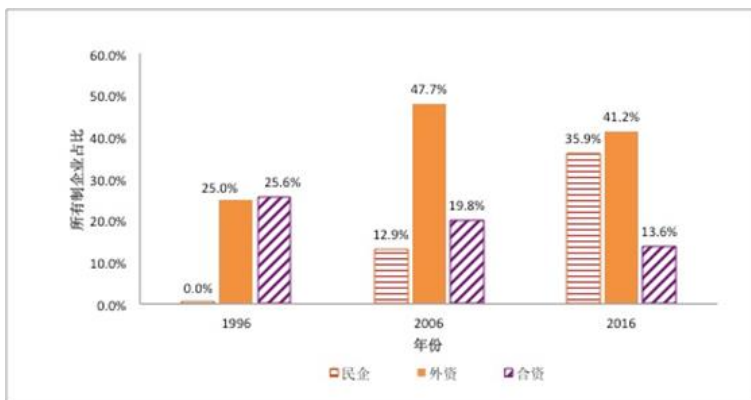
然而这远远不是全球价值链的全部。贸易本质上是不同生产地企业之间的交易。全球价值链上，最活跃的是跨国企业。要维持跨越大洋、串联多个国家的供应链的组织、协调、运转、优化问题，要缓解供应链上不同企业间的“不完全合同”约束下的合作、履约问题，就需要在产权和控制权上进行机制设计，这也给了跨国公司最大的施展空间。据统计，跨国公司的企业内贸易，占全球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的国际贸易在交易的一端也是跨国公司。本田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产量超过它在日本本土的产量。中国进口的宝马X5全部是在美国生产的。就美国贸易而言，进口一半以上都是跨国公司进行的。对中国而言，外资企业一直是中国出口的主力军。从行业角度讲，近10年来，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是机电行业，相比于纺织，机电行业由于其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零附件多的特点，就更加依赖于跨国公司进行国际贸易。

【图11：中国出口的所有制分布】

A：对全世界出口



B：对美国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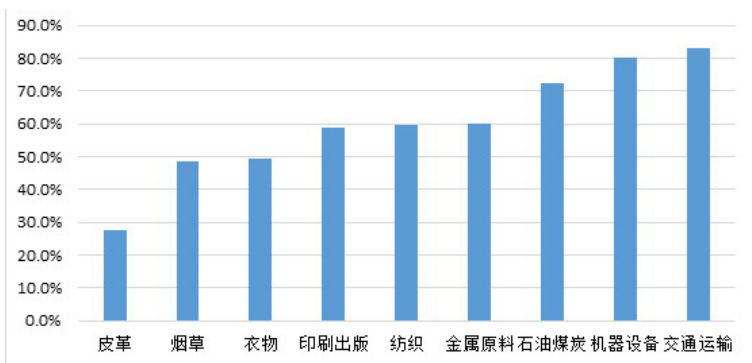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几乎可以说，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也正是这些拥有巨额资本，在利润最高处进行销售，在成本最小处从事生产、采购部件，在税收最低的国度储蓄巨额资金，从而勾连起庞大的全球交易网络的跨国公司。资本没有国界，跨国公司的高管们把自己当作世界公民。难怪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曾经的校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忧心忡忡地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促成了无国界精英群体的壮大，相比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他们更在意全球经济繁荣和他们自己的财富。”

那些不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从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汽车，到俄亥俄州杨斯敦的钢铁，到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城的电器工厂，那些阿巴拉契亚山脉沿线的纺织、皮革、家具厂，还有那些偏安于小镇一隅的本地企业，或成本过高，或规模过小，不能够参与到全球化供应链的，就被全球化的滚滚列车碾压于轮下。图12给出了美国主要制造业行业在2000年相比1980年的就业人数比例。这些行业，在80、90年代受到日本制造的巨大冲击，在2000年之后又面临产业转移和中国进口竞争的压力。

【图12：美国主要制造业就业跌幅（1980-2000）】



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纽约州，这些美国东北部的州依靠五大湖的水运便利，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钢铁、汽车、电器制造是这些地区的支柱产业，随着汽车和钢铁行业的衰落，成为著名的“铁锈地带”。这些地区和这些重工业，还有成长于斯的美国工人阶层，成为全球化的输家。而东西两岸，那些依靠信息技术，依靠研发、设计，而将制造工序外包至海外的科技公司，比如苹果、微软，那些全球采购商品的批发巨头，比如沃尔玛、塔吉特，成为全球化毫无疑问的赢家。

【图13：美国的铁锈地带】



除了跨国公司的高管精英之外，经济学家可能是世界上最支持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群体。无数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实证计量研究都证明贸易开放带来收入增长和福利改进。然而经济学家们也都

同意：贸易带来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贸易产生的基础是重新分工，而重新分工必然带来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行业扩张，而没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行业萎缩，进而带来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②因此，贸易开放之后，进口竞争行业受损，而出口行业扩张获益。在一个没有“摩擦”的经济体，进口行业工人能够迅速地退出并在出口行业重新就业，而如果这种退出再就业的过程并不顺利，那么这些工人就会成为贸易开放的牺牲品。最近的研究发现：低技能劳动力越来越难以在美国，这个曾经的世界最具流动性的社会，顺利地流动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本地制造业大面积地萎缩使得失业工人超过了新企业招工需求。另一方面，新的工作岗位往往对求职者教育程度和技能有更高的要求，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老年失业劳动者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最后，就像《乡下人的悲歌》这本畅销书里一再写到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带和铁锈地区的蓝领工人们被困在当地，难以迁移到机会更多的南方和沿海地区，也是他们生活日益困顿的重要原因。

除了由于流动性变差导致贸易开放带来的收入分配恶化之外，经济学家们还对一些新的情况提出了警告：第一，经过若干轮关贸总协定（GATT）的谈判，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税已经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根据WITS的统计，美国在2007年的加权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1.54%的水平。进一步减免关税的空间不大，收益也不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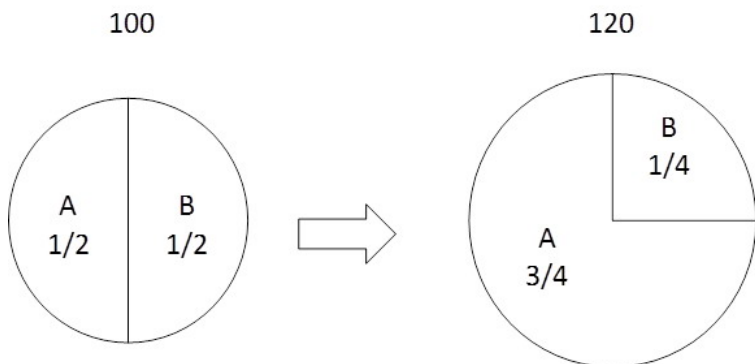
其次，生产价值链分工不断细化分解，工序外包的大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全球化。在新古典的李嘉图模型下，不同国家的工业根据比较优势（相对生产率）从事不同商品的生产，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其工资水平。但是在深度全球化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工序或者每一段工序都可以模块化，从而可以进行全球外包。工厂主（企业家/资本家）可以在全球寻找零部件（parts），工序（activities），任务（tasks），服务（services）性价比最高的提供商。20年前，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Freeman问美国人：“你的工资由北京决定么？”（Are your wages set in Beijing?）他经过论证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是今天，跨国公司完全可以用他们的海外工厂和愿意接受恶劣工作条件的

农民工作为筹码，压低国内工人的薪酬，反对累进制的税收，打压工会，鼓吹放松监管。可以说，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家的谈判筹码，而工人的筹码则相应减少。全球范围内工人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即是明证。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则更忧心“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破坏作用。他观察到新的信息、通信科技使得曾经“安全”的职位（某些医学、教育、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职位），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海外，在那里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工资要低很多。“这样，在发达国家，现在只有小部分工人要面对外国竞争，”他写道，“但是，将来会有很多人都要面临同样的困境。”布林德估计可以外包的服务行业职位是现在制造业职位的2-3倍。由于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美国总就业的80%以上，服务业外包对美国白领阶层的影响更大。

由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获益少，但又会带来巨大的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在发达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就越来越强。哈佛大学的丹尼·罗迪克教授（Dani Rodrik）尖锐地指出贸易自由化在收入分配上所造成的巨大混乱：“比如说，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体，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话，每获得1元的贸易“净”收益就要对50元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来描绘这种情景。在下图里，左图是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之前的情况，假设社会分为两个群体（A类和B类），分别占有全部社会资源或福利（100）的 $\frac{1}{2}$ 。右图则展示了进一步贸易开放后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假设整个社会福利由于贸易自由化增长了20%——因此总福利达到了120。然而由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一部分人（A类）获得了其中的 $\frac{3}{4}$ ，另一部分人（B类）则只得到 $\frac{1}{4}$ 。那么对B类人群来说，贸易自由化前，他们的福利是50，而贸易自由化之后，他们的福利下降到了30。

【图14：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



现实当然要比这个例子复杂百倍，但是结果是一样的：贸易的确会带来福利的改进，但同时也会带来福利分配的重新洗牌。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攫取了福利（注意：不仅仅是贸易带来的福利增量）的绝大部分。贸易，或者更广义上说全球化，同时制造了赢家和输家。在表1中，我们给出了若干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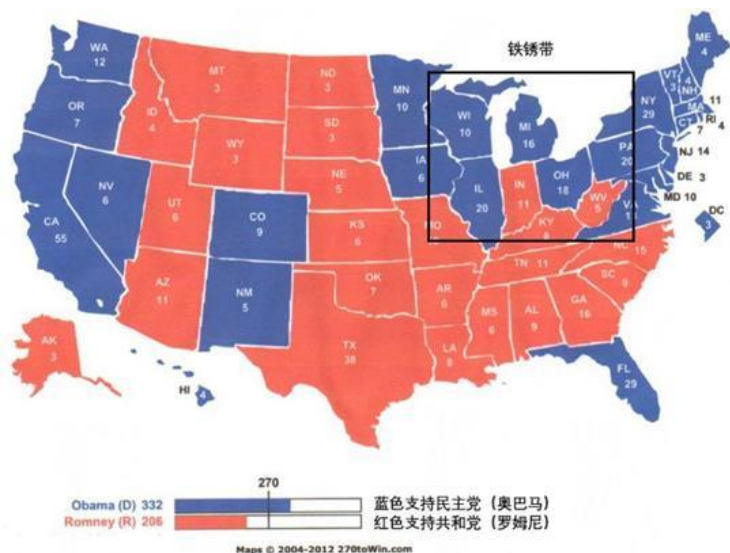
表1：全球化中的赢家与输家

赢家	输家
出口扩张行业	进口竞争行业
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	生产类似商品的本地厂商
跨国大公司	本地中小企业
硅谷	锈带
高技能、高学历工人，研发、设计人员	低技能、低学历工人，制造业人员

我们前面解释过，造成收入差距和就业问题等一系列恶果的重要原因在于被贸易替代的工人缺乏流动性。那么对应的解决之道就应该是：第一、增加流动性（减少摩擦），比如提供各种职业培训，提供跨地区流动求职所需的住房、信息等等；第二、转移支付，通过补贴将贸易带来的福利增量中的一部分支付给因为贸易而受损的群体，使得上图中B类群体能够得到全部福利的5/12甚至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不但带来福利的增进，而且是帕累托意义上的福利增进。

然而特朗普政府选择的是更为简单的一种方式：面对全球化，关上大门。面对汽车和钢铁工人，他许诺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因为美国每年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大量整车、零附件，以及钢铁制品。他许诺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他把贸易保护的炮火轰向中国。^③他聪明地利用了安格斯·迪顿笔下“绝望的白人工人”对现状不满的情绪。社交网络帮助他在关键时刻完成最后一击。在信息革命发轫之初，人们普遍担心的是计算机和网络会导致集权，最终引向乔治·奥威尔的1984。但事实上，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同时产生了强大的去中心化倾向，赋予了普通民众集合起来宣泄不满的巨大力量。民粹主义借助社交网络完成了他最后的动员。全球化的输家们，因为学历低、力量小而被政客一再许诺又一再忽视的锈带产业工人们，用手中的选票狠狠教训了全球化的精英。

事实证明，特朗普的竞选纲领深入（民粹主义的）人心。在锈带地区，钢铁，汽车等制造业工会力量强大，传统上是代表劳工利益的民主党的选举票仓。在2012年总统大选时这些州最终的选举人票都投给了民主党的奥巴马。在2000年时，这些地区也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尽管最后共和党布什赢得大选）。然而在2016年，民主党的铁票仓反戈一击。密歇根，俄亥俄，宾州，爱荷华相继翻红。总统在无大学学历的白人中年男性中的得票率达到了67%，而他的对手，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只得到了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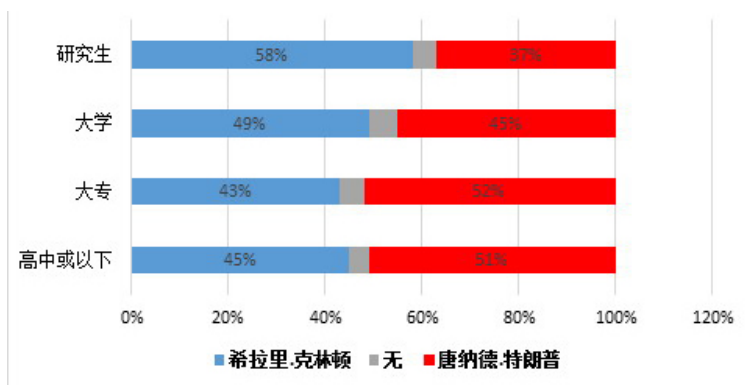
【图15：2012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各州投票情况对比】



和经济学理论一致，全球化的赢家属于高学历群体，他们在大选中更多地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而教育水平在大学以下的全体，则主要支持共和党的特朗普。特朗普曾经的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将其归功于右翼民粹主义活动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兴起，而他也承认特朗普总统将这一运动提前10年推向政治中心。从

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是“逆全球化”民粹草根运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图16：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情况】



-
- (1) 在没有GATT或WTO的情况下，社会制度给市场的“游戏规则”由各国的社会制度规定（道格拉斯·诺斯（Doug North）），那么如若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不同版本的“游戏规则”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体现在国际贸易上，就会产生过高的“交易成本”。
 - (2) 即使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内部也存在着争议。很多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偏向有技能、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这——而不是贸易——才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最主要原因。
 - (3) 在学术界也不乏对激增的中国进口的批评之声，Autor等人在一系列研究中指出中国进口造成了美国失业和劳动参与下降，降低收入水平，进而导致婚姻和生育的降低，减少企业投资、研发和创新，以及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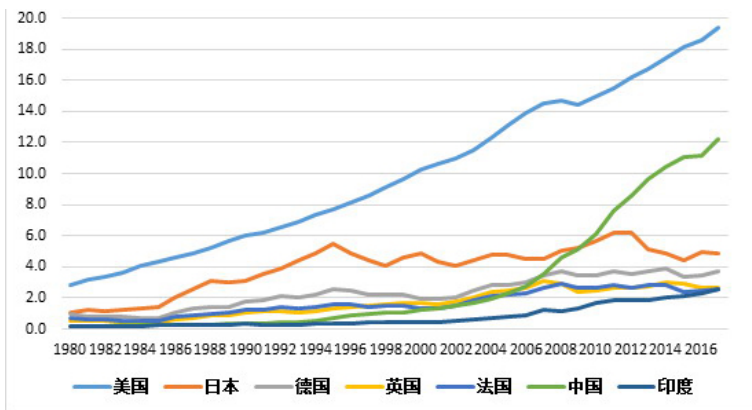
3．大国竞争的悲剧

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没人能假装中国只不过是又一个大的参与者。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李光耀，1994年

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构成了特朗普“去全球化”施政纲领的民意基础。美国并不从中国进口多少钢铁和汽车，因此，为了这个民意基础，特朗普不惜破坏原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汽车价值链生产安排，不惜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筑起高墙防止墨西哥劳工非法进入美国境内。同样，为了这个民意基础，特朗普一再威胁要对欧盟进口的汽车和钢铁加征关税。政治关系上，一个快速崛起的人口和经济大国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世界霸主的注意和疑虑。撇开政治不谈，只看经济，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到201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达到了11.39万亿美元，经济总量接近美国（18.56万亿）的62%。如果进一步考虑购买力和物价水平，那么中美之间在实际GDP上的差距已经无限接近了。^{（1）}

【图17：主要国家近40年GDP水平比较（万亿美元现价）】



中国在贸易上的表现更加抢眼。图17展示了按照2016年货物贸易出口总值排序的世界前5大出口国出口总值的历史变化。中国在1991年超过韩国，2004年超过日本，2007年超过美国，而最终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2017年中国的全年货物贸易出口值达到2.26万亿美元，分别是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1.46，1.56，3.24和3.95倍。这样的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一方面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另一方面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形成巨大的挑战：与中国出口相似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需求下滑；而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的发达国家，面对进口竞争的压力出现制造业失业增加、工资增长停滞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冲击”也成为近年来”逆全球化”（ de-globalization ）现象表面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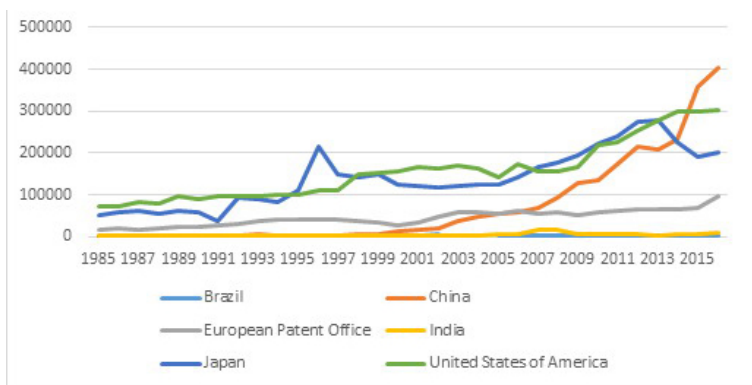
【图18：五大国出口总值变化】



数据来源：UN-Comtrade

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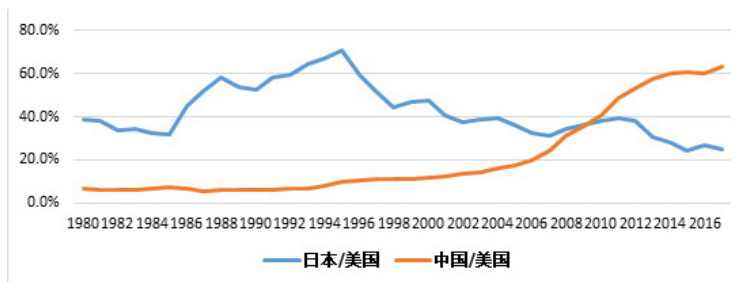
【图19：主要国家专利申请数量】



1996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了他备受争议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冷战之后，国际冲突将不再源自意识形态，而主要由于文明之间的斗争而展开。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里，亨廷顿写道：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

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亨廷顿认为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或者说文明之间的差异，而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亚洲与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冲突的强度。当然这种冲突也体现经济层面：1970-1990年间体现为美国和崛起的日本之间的贸易冲突，现在则体现为美国和崛起的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2)

【图20：日美、中美GDP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亨廷顿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里，文明是多元的，而全球化则可能加剧文明之间的冲突。要避免冲突首要的是要承认文明的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眼里的未来世界则更加悲观。在2001年出版《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书里，米尔斯海默提出由于大国的首要目标是安全和生存，而他们又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在没有超越大国之上的国际权威的环境下，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竞争和冲突，是为国家的悲剧。米尔斯海默描述的实际上是国家之间政治上的囚徒困境：参与博弈的大国明知合作能够共赢，但最优策略仍然是竞争和冲突。

如果说亨廷顿给出的药方是“接触”和“包容”，从而可以实现文明的共存。米尔斯海默则更倾向遏制。构建在米氏理论上，哈佛大学教授埃利森（Graham Allison）更是套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的斯巴达和希腊之间的战争，直截了当地指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即坊间热谈的“修昔底德的陷阱”。

吊诡的是，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竞争论，这样的概念一经提出，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概率不断强化。特朗普政府甫一执政，就推出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这两份文件都首次明确地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经济学家们也对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进行了解释。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那个作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的萨缪尔森，在2004年发表论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李嘉图模型，展示了一种中国在美国占比较优势的高科技行业实现技术超越，中美之间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形。萨老得出结论：尽管总所周知贸易壁垒不会增加经济福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国（注：指美国）一定会从他贸易伙伴国（注：指中国）的经济成果中获益。在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形下，美国可能受损。经济学家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2000）指出：在现代自由贸易环境下，一国的福利主要取决于其国际贸易产业的成果。贸易产业的成败事关整个国家的得失。

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它2018年3月15日那一期中，描述了中美之间技术“霸权”之争。它是这么开篇的：

“‘由苹果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在过去十年，iPhone手机背面镌刻的短句正表明了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在技术上的分工：美国提供大脑，而中国提供肌肉。”

然后作者显然是带着遗憾的口气写到：“现在不再是这样了。”中国是一个劳动充裕的国家，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衣服鞋帽、组装电脑手机）。这几乎就是绝大多数西方媒体、政客，甚至经济学家看待中国的刻板影响。

因此，当中国国务院在2015年下发《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业振兴计划通知时，尽管在国内媒体和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却意外地激起了美国政府近乎“膝跳反应”一样的回应。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行业发展指导性意见，“中国制造2025”对标的是德国“工业4.0”这样的规划方案。这份方案里，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质量效益、工业化和信息化、以及环保方面在中短期发展制定了具体的量化

目标（如表2）。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和时间表。

表2：《中国制造2025》中短期部分主要发展指标

类别	指 标	2020 年	2025 年
创新能力	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1.26%	1.68%
	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0.70	1.10
质量效益	制造业增加值率比 2015 年提高	2%	4%
	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	7.5%左右	6.5%左右
两化融合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50%	64%
绿色发展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15 年下降幅度	22%	40%
	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幅度	18%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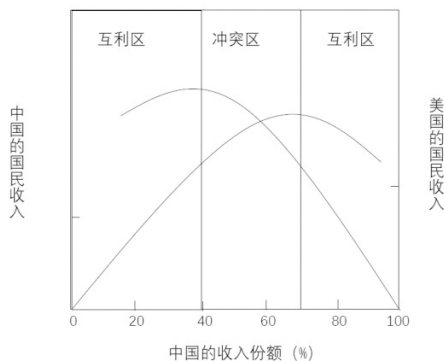
规划瞄准了十个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比如5G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比如大飞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目标是到2020年，在这些领域实现自主研制及应用；到2025年，实现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装备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强，重要领域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样的目标，显然瞄准了萨缪尔森构想的“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形。生产薯片（Chip）还是芯片（Chip），袜子还是飞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选择题。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而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人数高达2亿人口的时候，选择可以大量解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比如纺织、食品、锅碗瓢盆，符合一个劳动充裕而技术短缺的国家的比较优势；当我们一年毕业800万大学生，其中400万是工程专业时，要素禀赋已经发生了变化。时机合适时，没有人会拒绝升级。这不仅仅关系到利润，生产世界上最好吃的薯片、最漂亮的袜子，还

是运行速度最快的芯片，飞行距离最远的飞机，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并不可同日而语。毕竟，这个世界可以容纳成千上万家薯片工厂或者袜子工厂，而能够生存的芯片企业，飞机工厂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³⁾

秘密在于需求和生产两方面。在需求端，薯片、袜子、衣物面对的是偏好多样化的消费者，口味、款式、品牌、颜色、消费体验、甚至产品的“国别”都进入消费者效用函数（比如有消费者会特别抵制产于某国或者某地的产品），而芯片、大型设备、飞机等面对的是下游厂商，最关心的莫过于成本和质量。在生产端，薯片、袜子、衣物更大程度上是“线性”生产——将生产规模扩大一倍，生产成本也约莫增大一倍；而芯片、大型装备，汽车、飞机则具备巨大的规模效应——生产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降低成本。也正是由于其巨大的规模，进入这些行业需要事先投入巨大的启动成本，因此市场必须是寡占的一极少数厂商占据绝大多数市场。少数国家凭借科技和资本上的优势地位，成为在位寡头（incumbent oligopoly），而新进入者要顺利进入，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位者也会不惜一切捍卫自己的垄断地位。借用戈莫里和鲍莫尔（2000）的洞见，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描绘先发优势国家和后进入的竞争者之间的利益之争：

【图21：中美贸易和国家利益】



在这个图里，横轴代表中国所占世界收入份额——为简化起见，这里假设只有两个国家，纵轴是中国（左轴）或者美国（右轴）的国民收入，或者从贸易中的获益。当中国进入行业逐渐增加，相对美国的体量逐渐扩大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上升，在这个时候，美国的

国民收入也是在增加的。在这个区域，中美之间是合作互利的关系，表现为图左边的“互利区”。当中国经济占比达到40%时（注意：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比例，目前中国GDP占到美国的2/3），美国国民收入达到最高点，从中美贸易合作中的获益最高。随后，当中国经济占比进一步增加，美国国民收入开始减少，双方进入利益“冲突区”。只有当中国经济进一步增加达到世界的70%左右时，中美之间又进入“互利区”，因为进一步挤压对方反而导致市场的萎缩。

戈莫里和鲍莫尔用类似的图解释为什么二战之后美国需要用“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欧洲重建，因为一个成长的——但不是太大的——欧洲有利于美国经济，即美国和欧洲在互利区里。从目前中美经贸冲突频发的现状看，可能中美之间进入了冲突区。

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和最大的出口国之间的经贸冲突将重新定义现存的国际多边经贸体系。这一体系肇始于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熟于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迄今70年，为世界各国之间消除贸易障碍、促进商品流通、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主要创始国和推动者——美国——正致力于挑战这一体系。应当看到，这一危机的核心在于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美国）与不断成长的追赶者（中国）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关乎贸易可能造成的（美国）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也关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未来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中的潜在地位。

-
- (1) 在严谨的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物价水平不同——同样1000美元在美国和中国能够买到的同样商品的数目不同，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统计量是折算了购买力平价（PPP）的GDP。根据格罗宁根大学的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2010年中国的PPP调整后GDP为12.68万亿美元，同年美国的PPP调整后GDP为13.22万亿美元。数据来源：<http://febpwt.webhosting.rug.nl/Dmn/AggregateXs/PivotShow>
 - (2) 有意思的是，亨廷顿对美日之间在80年代的贸易冲突也做了一番解读后指出：在美日之间反复的贸易冲突存在一种既定的模式，就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以制裁相威胁。接着就是无休无止的谈判，然后在制裁生效前的最后一刻双方宣布达成协议。亨廷顿指出这种

协议的内容表述上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此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而日本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执行力度。

- (3) 比如在飞机这个领域，只有美国的波音，欧盟的空中客车，以及生产支线飞机的巴西庞巴迪。中国商飞制造的C919干线民用飞机，2017年成功首飞。

4 . 特朗普的武器

我的交易风格简单直接。我会订下非常高的目标。然后不断地施压、施压、再施压，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有时候结果并不尽人意，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最终还是会得到我想要的。

——唐纳德·特朗普《交易的艺术》，1987

不管是内忧（收入不均激发民粹主义），还是外患（中美之间的国力竞争），都使得特朗普总统甫一当选，立即决定遵守他的竞选诺言：

1 . 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2 . 任命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曾担任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长期负责钢铁贸易谈判，以在美日贸易谈判中强硬态度著称。

3 . 任命Wilbur Ross为商务部长，对美国签订的各项贸易协定进行审查。

4 . 2018年8月28日美国和墨西哥完成重新谈判。9月30日，美国和加拿大完成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将更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

5 . 特朗普任上三次美国财政部货币报告（分别发布于2017年4月、10月和2018年4月）中，中国并未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然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支撑人民币汇率，那不是操纵汇率。如果他们让人民币贬值，不管是出于结构性原因或者是出于实际操作，都是操纵行为。⁽¹⁾

6 . 2017年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²⁾，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适用“替代国”的做法。美国贸

易代表在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上针对中国提出多项贸易制裁。

7. 对华采用1974年《贸易法》第201节、301节以及1962年《贸易扩展法案》第232节所规定的关税惩罚措施。具体包括：2017年4月要求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展开232调查，于2018年3月宣布分别征税25%和10%。2018年1月22日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2017年8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6月美国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进口关税，9月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具体而言，短期内美国政府可能通过进口保护、出口市场准入、综合措施（比如汇率操控指控）等诸方面来限制中国贸易，长期而言还有可能重新开启类似TPP的多边规则来孤立中国。虽然针对中国的特保“421条款”已经过期，但美国还可能频繁使用以下多种贸易保护措施。表1总结了美国可能采取的各项贸易保护措施。

全球保障措施是美国针对进口商品对国内厂商或行业造成主要损害或威胁时采取的关税措施。2001年，布什政府曾对钢材进口征收30%保障性关税。其依据的201条款针对特定产品，但通常不能针对特定国家，打击面比较广，容易招致对手国家报复。2017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分别对进口光伏电池及组件和进口大型家用洗衣机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2018年1月22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

“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是美国最频繁使用的贸易武器。1995-2015年间，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共发起132件反倾销调查和51件反补贴调查，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23%和13%。其中后十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共发起76件反倾销调查和51件反补贴调查，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34.9%和46.8%，较前十年更为频繁。图3对比了中美两国1980-2015年期间对对方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数及占本国总调查数的比例。中国近二十年来有用“双反”调查“反击”美国的势头，但无论是从案件数目还是从占本国总调查案件

数的比例来说，调查力度均不及美国。相比之下，日本受到美国的贸易调查则相对较少。即使是日美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1980-1990年间，美国对日本共发起67件反倾销调查和1件反补贴调查，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13.2%和0.3%。1995-2015年间美国仅对日本出口产品发起39件反倾销调查（6.7%）。可见日本受到的双反调查不如近十年来中国出口厂商受到的强度大。

另一方面，以侵犯知识产权和不公平竞争为名义的337调查也是美方打击中日等贸易竞争者的有力武器。该调查主要针对美国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主要是专利侵权，较少涉及商标、版权），也包括其他不公平竞争方法或不公平行为（如行贿、垄断、侵犯商业秘密等）。相比双反调查，337调查成本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不需要证明对国内厂商造成损害，而且惩罚严厉——“侵权”产品可能被完全禁止入境（龚柏华，2017）。1995-2005年间，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发起了46件337调查，而2005-2015年间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共发起150件337调查，占立案数的33.3%。相比之下，1980-1990年间，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发起55件337调查，占立案数的22.2%。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有向高科技领域发展的趋势，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将面临更多贸易保护政策的障碍。

更为严格的原产地标准（ROO）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进口的武器。ROO衡量产品在本国生产的程度。为防止转口逃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原产地标准规定一件产品在北美区域内部生产的价值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中也分别规定了ROO标准。多轮NAFTA重新谈判中，美国要求将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区内产值含量比例从目前的62.5%提高到85%，并要求总投入的50%必须来自美国。这将打击中国零部件生产商对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监管当局对通过自贸协定渠道输美的产品加大了“反规避调查”力度，例如2017年12月，美国商务部依据原产地标准初步裁定越南输美不锈钢和冷轧钢板材涉嫌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正是因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来自中国。有研究发现通过《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免税进入美国的纺织品，相当部分来自于

中国厂商的直接转口（Rotunno等，2013）。这类出口极易招受美国监管部门的打击。

美国迫切地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因此可能使用301调查来压迫中国扩大“市场准入”。301条款内容可分为“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一般301条款是指在美国贸易代表认定不公平贸易情况下，美国可以采取单边报复措施；特别301条款将其效力延伸至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而超级301条款则主要针对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国家。正是日本在80年代的强势扩张，直接导致了“超级301条款”的推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开始表达对中国吸引外资指导文件中“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不满，可能会通过“特别301条款”对中国进行打击。

美国财政部每年两次的汇率操纵调查也能给中国施压。每隔半年美国财政部会依据三条标准来评估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水平，即巨额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大量经常账户盈余、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同时符合三条标准的国家会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³⁾。不过，美国一般不直接对汇率操纵国实施经济制裁，而是展开双边谈判，以敦促该国解决汇率问题。而各国也确实会在被冠以“汇率操纵国”之名后做出反应。韩国自1988年被列入汇率操纵名单到1990年从名单中除名，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重从6.7%降至-1.2%；中国在1994年被指控汇率操纵后，对美出口增速连续18个月出现下降。虽然此后美国再没有将任何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汇率操纵调查背后的“威慑力”不容小觑。况且，特朗普总统可以指示财政部对以上三条标准进行调整，因此中国在汇率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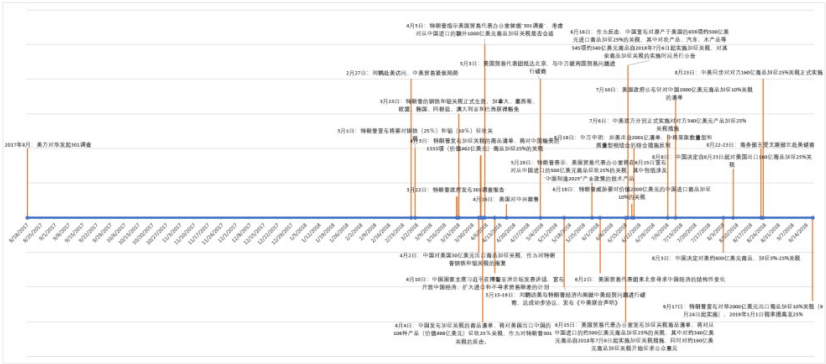
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了泛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但是TPP协议中对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的关注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TPP是上任奥巴马政府寻求在WTO多边框架之外重构国际贸易规则的尝试。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国家主权，但并不排除他日后寻求类似TPP的替代方案，甚至重返TPP。

表3 美国的贸易保护武器

保护措施	美国国内法律依据	是否与 WTO 规则一致	触发原因	案例	备注
针对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					
全球保障措施 “201 条款”	《1974 年贸易法》201 条款	《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19 条 1a	进口对国内产业/企业造成主要伤害或威胁	2001 年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 30%保障性关税(欧盟、日本、韩国是主要进口国)。	不特别针对某一国家 常常导致对手国报复
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	《1930 年关税法》第 7 节	《1994 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6 条 1a, 1b.	不公平(unfair)贸易: USITC 判断进口是否造成重大损害(或形成威胁); 商务部判断进口商品是否低于公平价格销售以及决定税率	2017 年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裁定中国企业 63.86% 76.64% 的反倾销税率和 75.0% 196.71% 的反补贴税率。	1995-2015 年间, 美国对中国大进出口产品发起 132 件反倾销调查和 51 件反补贴调查, 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 23% 和 13%
“337 条款”	《1930 年美国税法》第 337 节, (美国 1988 年综合关税与竞争法), (1995 年美国乌拉圭回合协议法) 修订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	不公平(unfair)贸易-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其他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行为; 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调查不需要证明对美国厂商造成损害	2016 年对中国输美碳钢管产品发起 337 调查。	1995-2015 年间, 美国对中国大进出口产品共发起 196 起 “337 调查”, 占立案总数的 30%
原产地标准 R00				2017 年 10 月美国贸易代表宣布提高 NAFTA 内部生产比例和美洲生产比例(特别是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国家安全调查 “232 条款”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款	美国单边措施	进口商品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特朗普于 2017 年 4 月要求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展开 232 调查; 于 2018 年 3 月宣布分别征收 25% 和 10%。	很少动用, 1995-2015 年启动 2 次调查, 均以总统否决告终
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 “421 条款”	《1974 年贸易法》421 条款	不符合世贸组织 “最惠国” 原则, 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先决条件	中国进口对国内产业/企业造成显著伤害或威胁 (significant cause of injury or a threat of), 无而是主要因素	2009 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轮胎进口征收 35% 保障性关税。	针对中国, 2002 年生效; 2002-2008 年间 USITC 通过 6 次针对中国的特殊调查, 均被布什总统否决; 于 2014 年过期
“自愿” 出口限制 (VER)	美国与出口国协议			1981 年 5 月美日达成协议, 将日本出口美国汽车数量限制在每年 168 万辆。	在 VER 框架下各国均同意不再执行 VER

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 (续表)					
保护措施	美国国内法律依据	是否与 WTO 规则一致	触发原因	案例	备注
针对出口的贸易保护措施					
“301 条款” 调查	《1974 年贸易法》第 301-309 条	美国单边措施; 1995 年关贸总协定 (GATT) 升级为世贸组织 (WTO) 后, 通常通过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	对美国出口的不公平或歧视性待遇	截至 1989 年, 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 24 例 301 条款案件调查, 几乎均使得日本政府做出相应让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
一般 301 条款	《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2017 年 8 月 18 日, 美国贸易代表署希拉里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 “301 调查”。	
超级 301 条款		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公开确认违反违反美国开放贸易准则的国家, 并提出纠正这些违规行为的针对性行动		1989 年, 为避免被美国第一份超级 301 名单提名, 韩国政府将关税减半, 减少进口限制, 并同意免除限制进口的 “本地化” 规定。同年美国针对日本的卫星、超微型计算机和木材制品启用 “超级 301 条款”。	
特别 301 条款		针对 “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		90 年代早期中国数次遭到 “特别 301 调查”。	
要求市场准入对等 (reciprocity of market access)				2017 年美国一些食品进口商联名写信希望中国可以适当减少对外进出口食品的检测力度。	农产品, 禽肉类 汽车 服务业
其他综合措施					
“汇率操纵” 指控	《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2015 年贸易便利及贸易执行法》、2005 年《舒默-格拉尼姆法案》针对中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15 条第 4 款	美国财政部每隔半年审核主要贸易伙伴是否通过人为压低汇率来获得 “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三个认定条件分别是巨额对美货物贸易顺差, 大量经营账户盈余, 以及持续、长期的外汇干预。	1985 年美国要求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日元升值一倍。《舒默-格拉尼姆法案》规定, 如果中国在一 180 天内提高人民币币值, 那么 “美国针对中国生产、制造、组装, 并直接或间接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 27.5% 的从价关税”。2005 年 7 月人民币开始升值 7 年的单向升值通道。	

【图22：中美贸易战时间线】



敬请期待后续内容。

- (1) CNBC采访 (<https://www.cnbc.com/2018/08/28/mnuchin-praises-china-for-supporting-currency-not-manipulation.html>)
- (2) 参见 : <https://www.ustrademonitor.com/2017/10/commerce-continues-chinas-status-as-a-non-market-economy/>
- (3) 《1974年贸易法》122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在不超过150天内对进口商品征收不超过15%的临时性进口关税和临时进口配额的权力，但该条款需在美国国际收支出现重大问题或美元在外汇市场出现严重贬值趋势时才可触发。